

24

黔史一鱗

朱崇演 著

贵州近现代史研究文集

第一集

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編



黔 史 一 鱗

朱 崇 演 著

永璞同志 教正

朱崇演敬贈

1996. 8. 20

貴州近現代史研究文集

(之一)

貴州省史學學會近現代史研究會編

1996年5月

序

秦天真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历来有着重视历史资料的保存和研究的优良传统，目的是“以史为鉴”，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教导我们，要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大的帮助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的史料征编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符合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精神。

朱崇演同志把十多年来研究贵州近现代史的一些心得汇编成册。在史学研究的百花园中绽开了一朵新花，值得赞许。

早在1951年，我担任贵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时，崇演同志作为部队转下来的青年干部，就在我身边工作过。他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勤于笔耕，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史工作者，对他的成就，我由衷的高兴，希望他戒骄戒燥，继续进步，为史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

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学术部



(作者夫妇合影)

本集作者
朱崇演, 笔名洪
波、何涛、童寅,
1931年3月出
生于湖南省蓝
山县, 汉族, 中
共党员, 副编
审, 现任贵州省
史学学会近现
代史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中国近现

代史史科学学会理事兼贵阳市会员联络处主任, 贵州省史学学会常务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军大二野五分校校史研究会理事、贵阳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贵阳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贵阳文史》副主编,花溪区周渔璜、周钟瑄研究会顾问。曾任贵阳市政协委员,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和中共贵阳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

该作者曾就读于上海法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法律系。贵阳解放后参军,后转业地方工作,先后在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贵阳市民政局、中共贵阳市委统战部任助理秘书、秘书。

1959年到贵阳市政协政治学校和市政协工作，先后任秘书、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文史办公室主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和副秘书长等职。是政协贵阳市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1964年市政协建立文史工作组，该作者就开始投入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1981年起，专职作文史工作，创办了《贵阳文史资料选辑》，曾任该刊物的副主编和编审。该刊已出版48辑，先后印行十余万册公开发行到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朱崇演同志在从事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同时，还致力于贵州近现代史的研究和统战理论的研究，先后在中央和省、市报刊文集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资料60余篇，50余万字。曾先后获贵阳市委机关党委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贵州省政协授予的全省政协工作先进个人、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授予的党史工作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授予的优秀文史工作者等称号。

崇演同志的作品《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伟大功绩》获贵阳市第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周西成在贵州的新建设》获贵州省史学会1978年—1987年优秀社科成果奖，《周钟瑄在台湾诸罗县》获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优秀成果二等奖。参与编辑的《抗战中的大西南丛书》获全国政协优秀图书一等奖，《贵阳的少数民族》获优秀奖等多项奖励。

目 录

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伟大功绩·····	(1)
试论贵州辛亥革命的成败·····	(19)
贵州参加护国运动的发起阶段·····	(31)
贵州参加护国运动的内因初探·····	(39)
贵州人民对我国旧民主革命的重大贡献 ——兼论护国运动的重新评价·····	(52)
周西成在贵州的新建设·····	(65)
抗战初期贵阳学生运动的几个问题·····	(79)
“民先”贵阳地方队部活动概述·····	(85)
贵阳市临时治安委员会简介·····	(101)
黔剧的历史及发展·····	(120)
帮会在贵阳的活动·····	(130)
鸦片对贵州人民的毒害·····	(146)
怡源字号·····	(162)
张学良将军在大陆囚禁的十年·····	(175)
张学良将军在贵阳·····	(188)
荣独山教授谈红会救护总队·····	(194)
红会救护工作拾遗·····	(199)
创业艰难百战多 ——访邓止戈同志·····	(205)
一名战士对将军的深切怀念	

——记左匡斌副校长身边工作的岁月·····	(209)
刘方岳·····	(222)
姚华悼方舟烈士的两首诗·····	(228)
怀念谢鑫鹤同志·····	(230)
周钟瑄在台湾诸罗县·····	(240)
周钟瑄对开发台湾的贡献·····	(250)
任可澄在护国运动前后·····	(255)
解放后贵阳市的统战工作·····	(26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贵阳市政协工作·····	(276)
六十年代在市政协工作的回忆·····	(289)
文史工作十五春·····	(296)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做好文史工作	
——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的初步体会·····	(306)
回忆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工作的协作·····	(318)
建国后史料征编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325)

附 录：

贵阳市建制沿革略述·····	柴晓莲(330)
痴情不改写春秋	
——记全国优秀文史工作者朱崇演·····	周诗若(344)
没有划圆的句号	
——编后絮语·····	(346)

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伟大功绩

毛泽东同志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之外，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实现和完成由孙先生揭开序幕而未完成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并且继续前进，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山先生亲手制定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主要内容和有关项目，现在都已得到实现，而且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山先生原有的构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先生一生孜孜以求的国家统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现在，党和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建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因此，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学习和宣传孙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伟大功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李维汉同志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一文中指出：“革命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团结和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瓦解敌人，这是任何革命斗争取得革命胜

利的根本条件。自鸦片战争的时候起,先进的中国人在反对外敌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的斗争中,都在寻找、团结同盟者,并且曾经多次地在某种范围内结成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先生,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为寻找、团结同盟者作了长期的努力。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在这场斗争过程中,曾谋求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合作,企图结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同盟,没有取得成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这次革命所以能在全中国取得响应,是因为“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②辛亥革命以后,首先由于同盟会本身成员复杂,良莠不齐,组织涣散,加上“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论调有较大的市场,使同盟会结成的以反清王朝为斗争目标的统一战线,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最后终于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根本无法贯彻。他的思想非常痛苦,“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③1912年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这时,孙先生对国民党事务未加过问,一心考虑建设问题。

1914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统治,中山先生领导了一部分国民党员组织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4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这段时期,孙中山先生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开展护国和护法运动,也进行了寻找和团结同盟者的工作。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军阀身上,致使长期没有一支真正的同盟军。周恩来同志

写的《革命救国论》，诚挚地建议说：“我们所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申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这里说的五派革命势力，是指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的工商业家和广大的农民阶级。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则是指北方的直、皖、奉三派旧军阀和南方的新军阀联省自治派。当时的情况正是把希望寄托在新旧军阀身上，结果往往因这些军阀的背信弃义，而使孙中山先生处境非常艰难，一筹莫展。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努力下，经过将近两年的酝酿准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终于与共产党建立了第一次合作。这样，国共双方都在当时的条件下，圆满地解决了同盟军的问题。

二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由于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是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相一致的，因而大会宣言所制定的政纲，实际上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这次大会正式同意共产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并选举产生了

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些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领导工作。随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大部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改组，这就使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1924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第一次建立了国民党直接领导下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先后镇压了商团叛乱；进行了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反动军队；平定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接着又进行南征，击溃了广东南部邓本殷的反动军队。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为北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工农运动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2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也随之而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革命大风暴，全国上千万群众投入了这场斗争。在这次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这时，农民运动也在蓬勃兴起。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各地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首先在广东的东江、北江、西江许多县建立了农协和农民自卫军。随着形势的发展，湖南、湖北爆发了空前未有的农村大革命。由于工农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武装的建立，才有可能使北伐

战争取得辉煌的胜利，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出现“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④

周恩来同志在《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叙述了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重大变化：由于国共实行合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不仅把影响扩大到南方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而且还扩大到北方。中国国民党由于共产党人的加入而充满了生机，它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已在全国建立了十个省党部和四个特别市党部，共有党员九万二千八百人。^⑤同样，由于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共党员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时只有四百二十多人，到1927年已发展到将近六万人。

三

孙中山先生为实现国共合作和维护两党的团结，坚决排除来自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阻挠，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与右派的尖锐分歧和斗争。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国民党右派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先生，反对联俄、联共。这些人别有用心地挑拨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说什么党章草案“定总理一职为选举职，……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孙中山先生对这封信的荒谬言论，逐段作了严正批驳，告诫他们不要“疑神疑鬼”。^⑥

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国民党右派林森、谢持、邓泽如、

方瑞麟等人多次密谋反对国共合作。1月28日，他们趁孙先生没有出席大会之机，由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在大会发言，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提出要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规定。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作了公开发言，对右派的挑畔作了回击。他提出“对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对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⑦大会经过辩论和表决，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这次大会后，国民党右派冯自由、谢英伯等人又生事端，说什么“海外同志对第一次大会很有怀疑”，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对这种谬论给予了严厉的训斥，严肃宣布：“如果对于第一次大会决议，还有怀疑，可以通通出党，我可以一个人就正式改组本党的。”^⑧周恩来同志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党籍。改组首先受到他们的反对与破坏是不奇怪的，因为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⑨

1924年年6月1日，孙科等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同月中旬，右派邓泽如、谢持、张继等人联名发出“弹劾共产党书”。同月下旬，谢持、张继等又猖狂地找当时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谈话，表示反对国共合作。8月份，这股反对联共政策的逆流遍及大江南北。上海、北京、汉口、广

州、香港等地的国民党右派，相继提出了百余件“弹劾”共产党的议案。他们还有广州、北京等报刊上频频发表文章，鼓吹分共和清党。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鼓噪，并没有动摇孙中山先生坚持推行三大政策的决心。1924年7月7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8月13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都一再表示要坚定地维护国共合作。8月15日，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谢持、张继等人的《弹劾案》进行辩论，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务之训令》，再次明确肯定了联共政策。由于孙中山先生坚定的立场和崇高的威望，尽管国民党右派一再反对和破坏，国共合作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还是在风浪中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事业也在迅速发展而出现了大革命的高潮。

四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政治基础，攻击方向“对内是打破军阀，对外要打破列强的干涉。”^⑩孙中山先生多次指出，由于军阀是受帝国主义操纵、支持的，因此打破军阀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是说，不论对内对外，主要斗争目标是帝国主义。孙中山先生为维护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所倡立的民族主义学说，也在斗争中有了新的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前，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解决国内的民族压迫，反对满族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只有模糊的“维持国际地位平等”和民族独立的一般要

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国家不但没有统一，“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害之烈，较前尤甚。”^①而这些强盗（指军阀）的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②孙中山先生从而得出了军阀和帝国主义乃是“中国内乱之因”、“祸乱的根本”的结论。为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把他的民族主义，重新解释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③在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中，都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突出内容。在1924年9月18日发表的《北伐宣言》中，孙中山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帝国主义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学说和国共两党结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十分仇视。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对此曾大肆造谣诬蔑，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并出动军舰进行威胁，支持反动买办和军阀武装叛乱，开枪屠杀工农群众。他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加以扼杀，以达到其“瓜分”、“共管”中国之目的。孙中山先生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反帝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1923年11月下旬开始的收回粤海关“关余”（海关关税余款）的斗争中，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声言要以强硬手段对付广东革命政权，英、美等帝国主义出动军舰20余艘进入广东内河，张牙舞爪地进行威胁。孙中山先生在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严正声明“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